

「對照記」：讀《革命·啟蒙·抒情——
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

“Comparison”: A Book Review of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and Lyricism, Th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丁 文*

Ding Wen

一、一個群體故事的啟示

《革命·啟蒙·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¹是一本對32位學者的學術訪談集。目錄上的長串名單，早已成為青年學人心中的學術楷模，眾位採訪者傾力投入後的清晰描述，使本書留存著一批活躍在學界前沿的資深學者群像。鬢髮上的銀絲映襯著他們

* 作者現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語學系副教授。

¹ 李歐梵、王德威顧問、鄭文惠、顏健富主編：《革命·啟蒙·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年）。以下引文標注該書頁碼於後，茲不贅注。

身上那股「青年人一般的能量」（頁166），臉龐上洋溢的「樂之者」的熱情（頁166）、那種想要探究現代人生的內在興趣，使得學術與人生的結合在這裡不再是一句空話。當我們有機會感悟那些文章背後個體生命的性情與姿彩時，好奇漸漸變得不那麼重要，更多的是一種心有所感式的觸動。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鄭文惠老師帶領的「中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論壇成員是完成採訪的主要力量。由年輕學者邀訪資深學者，其閱讀對象也將以年輕學者為重要群體，本書因此「猶如鏡像投影般含蘊著多重多層的隱喻」（頁498）。採訪者專業具體的話題設置，使受訪者有機會觸及許多極有助益的經驗談；而閱讀者入行未久的身分與心態，也使閱讀過程成爲一種當下與未來的對話錄：由尋繹前輩的學思之路來構思未來之我的面影。因此相較於作爲書中主人公的受訪者，採訪人與每一位翻開本書的讀者，都是本書最大的受益人。

訪談的形態，讓本書能以親切的方式對學科進程進行回溯，全書標題中的「革命」、「啟蒙」、「抒情」三個關鍵字則高度概括了海內外學界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照的演進歷程。關鍵字或許標幟出研究重心的遞進，卻並不意味著前一層主旨的淡出。正如本書強調現代文學之抒情模式與史詩模式是一種「犬牙交錯」而非「一刀斷流」的狀態（頁270），近來學界重新勾勒抒情脈絡的動向，也使得「革命」或「啟蒙」話題因爲新元素的納入與映照，而變得意蘊重重，先前的認知也有可能推向縱深。而這一領域資深學者們的集體努力，實際上也指向一個共同目標：還原出近現代文學次序井然的整飭敘述背後的紛紜蕪雜，這種潛行於歷史底層的摸索工作，則又是爲了能從更高層面透視文學古今演變的內在規律。

在這一目標驅使下，上世紀七、八〇年代以來的學科話語經歷了數重轉變。由作家作品研究轉變爲九〇年代以後「加倍重視理論」，現代文學研究開始融入國際話語，文化研究與跨學科研究引發學者興趣。（頁24）但與關鍵字迭出的境遇相同的是，學科國際化之後與理

論話語的接軌，在為人們帶來新啟迪的同時，是否將開啟新一輪的反思？那些構築了學科基石的作家作品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新話語的激蕩下展露出被淡漠已久的面容？文本在理論的燭照下，是否有可能煥發出不可思議的潛力？抑或是，文本與理論的辯難將加倍製造殊費思量的困惑，尚需來者進行彌合與闡釋？

近年來臺灣學界的近現代文化研究表現活躍，其開闊而包容的視野使本書具有「以域外學者的研究為採訪重點」的特色，雖然這在編者是出於編排「策略」的考慮（頁499-500），但由大陸語境中的讀者讀來，卻正好藉此獲得種種耐人深思的啟發。

通過每篇訪談之前的受訪者簡介，本書集中展示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海外著述，值得細心讀者詳加檢視。然而乍一讀到，最初感受卻是興奮與沮喪並存。原來我們對不少海外學者，都還停留在只聞其名而不知其書的階段，相當一部分作品未被譯成中文。不少成果，海外學者本人很重視，實際上對人也很有啟發，但國內學界就是很少提及。同時，此岸的發聲也很難被對岸聽見，真正激蕩思維火花的學術交流尚無從談起。事實上這種交流碰撞極有可能醞釀產生相得益彰的思想晶體，² 但此類情形很不常見，要實現「跨區域、跨國界的互動」（頁130）更非朝夕之功。

大陸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淡漠與隔絕的原因：我們的問題在於「不瞭解別人，也很少去研究別人」（頁482）。想像中，海外漢學的場面當是鬧熱喧騰的，但本書所呈現的海外學者的研究思路竟是一片質樸無華：他們非常重視報刊等基本史料；運用理論不趕時髦，而是選擇最心儀、最合適的，他們鼓勵學生不要「亦步亦趨地跟隨既有的研究方向」（頁78）；強調好論文就是能談出新東西，要與研究對

² 如賀麥曉讀到王曉明〈一份雜誌和一個「社團」：論「五四」文學傳統〉，注意到作者重視文本之外的文學史的思路正與自己想法合拍，而讀者進而提出要直接研究這一時期「整體性的文學實踐」，而不是勾勒出一種反五四的傳統，再次樹立和確認了一種事先不預設任何價值的研究思路，參見頁173。

象保持心靈對話……。

造成這種陌生與隔絕的原因，首先是外語程度不充分。有學者針對西方研究者提出要「更重視研究者的語言訓練」（頁182），這一提議對大陸青年學人同樣極富建設性。要成為真正的專業研究者，學語言、讀原著便應當被安排進日程。

但更重要的因素卻來自心理上的人為設限。大陸學界對於海外同行的探索與努力，至今仍未真正擺脫自我屏蔽的態度，常見情形是自覺不自覺地視而不見。我們始終未脫一種「合群的自大」，例如研究綜述與參考文獻中，海外成果往往只是錦上添花的點綴。而在不關心別人的同時，我們有時也未必全然了解自己。試以某個關鍵字來搜索中國期刊網上的論文，不難看出很多文章重複度很高、視野有待開拓。這樣的故步自封，導致很多青年學人愈加肯定本屬無奈之舉的「閉門造車」，從而穩定了學界的固態局面。

或許一個毛躁的學術時代呼應著年輕學人內心那個「出名要趁早」的聲音，批量複製遂伴隨急於求成的焦慮一再出現。此時，當我們聽取學界前輩闡述一篇論文有無新發現是其是否值得發表的標準時，我們會為這種近乎嚴苛的自我規範而悚然心驚，同時更汲取到警醒的力量。是堅守自我還是隨波逐流？每個青年學人心中或許都曾經或正在迴盪著一個哈姆雷特式的拷問。在此情形下，聆聽來自異域的聲音，或許將幫助我們找回那個真正的自我。

但頗為奇特的是，一方面我們忽略著海外研究，主動捨棄了不少本可以拓展與啟迪自我的機會，另一方面卻又在盲目挪借海外理論時顯得荒腔走板。美國漢學早在大陸或臺灣尚處政局緊張對峙之際便已開啟進展，故能取得值得重視的成就，其強烈的理論色彩使得起步較晚的大陸學界往往目眩神迷，表現得無所適從。西方理論在走進大陸學界的明顯時差只是這種茫然狀態的一種表象：如海外開始思考如何挖掘中國文學的傳統理論資源之時，我們該如何拿來西方仍然被無限期地擱置在議程表上；當我們仍然強調文學史的「民族國家史觀」

時，海外漢學已經從哲學層面反思這一提法的脈絡與偏頗。大陸語境中的學人仿佛已經不太習慣權威話語的消解，一旦舊有的文學史線性線索被告知是可疑的，便會匆忙地選擇或拼湊一些外來理論以填補敘述中的文氣不暢。因而理論運用更多的是一種片斷式截選與拼接，至於如何正確理解諸般理論的優勢與局限、以清醒的姿態選擇與建構屬於自我的體系，或是讓理論之間互相碰撞以產生新的理論，一時間都還顯得遙遙無期。的確，「學習和實踐理論是一個學者最大的挑戰」（頁33），非西方研究者在面對西方理論時，必然要經歷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青年學人究竟能不能在我們的世代完成這片荒原中的摸索，走出信心不足的困境，實在充斥著極大變數。

回到近現代文學發生的歷史現場——中國大陸，會發現因為歷史腳步並未走遠，學科中的人為設限與拒絕也因此特別多、特別惹眼。

首先，現行教育體制下培育出來的研究者，其知識結構與研究對象極不對等，大陸文學研究常常是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井水不犯河水，專家多、雜家少。有學者認為要從長遠考慮重走傳統的文史哲結合的老路，讓研究者真正具有平視研究對象的資格。而本書一些資深學者身兼二任、跨越不同研究領域的軌跡，則向人昭示了一種局部突破的可能。一些學者出身於古代文學，後來自然接觸到近現代文學的議題，或是不滿足於囿於範圍有限的現代作品而上溯到古典文學，這類或「順」或「逆」的延展，正展示著一種相對全面的思考模式。研究者在古代文學資源的澆灌培育下，有可能對現代文本獲得深一層的理解，藉助其它學科的思維方法將來窺探文本的秘密，而跨越古今文學藩籬，將現代文學納入到中國文學傳統中考察，更有可能突破本學科的瓶頸。或許，立得住的現代文學研究，融入古代文學的基本方法將成為無需論證的途徑。

這不禁讓人追問：現代文學不過是中國文學史長河中的一瞬，學科的發展、將來歷史定位，均充滿未知數，這門今日從業者甚眾的學科裡，究竟有多少青年學人具備如此潛質、認為今後有可能拿出在前

輩面前不致太過愧赧的成績，又有幾人能對作品有一番自信，認為能經得起後世的品讀評判？實際上，以相當局限的專業訓練來處理一段與政黨意識形態關聯緊密、時段極短的歷史，由此造成的重重誤讀與偏見，使得狹隘幾乎成為本學科的特質。

由此再來省思始終備受學界質疑的學科起點與斷代問題。現有的起點被設置在了1917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即便在西方學界亦是如此看法，這一思路一直未能真正脫離社會革命與文學史相混同的非學術考量。這也使得研究者始終籠罩五四情結中無法走出。它可能造成的損害是：「五四」本身或許正包含了不少先入為主的偏見，當某種先天受到肯定的預設價值成為一種典範與斷代標籤時，局部便遮蔽了整體，同時代的不同聲音便有可能被壓抑。或許在西方漢學中也存在一些條條框框，某種觀點有可能因為與「常規」看法不同而不被認可（頁193），但相比較而言，國內研究的桎梏顯然更為堅實。

這一點也影響到了五四之前的文學研究。例如，從晚清到五四的銜接與過渡越來越為學界矚目，但有人提出至今為止的晚清文學研究，多半仍從五四的看法和立場出發，人們往往習慣用五四的家國想像去詮釋晚清，使晚清變得窄化，而其最吸引人的，正是那種曖昧、混雜的多元氣象、一種「猶疑不決、不能被定位的特質」（頁70）。為了彰顯五四價值，人們在研究中刻意將近代小說與五四接軌，結果造成的是「近代小說與古代小說無法對接」（頁413）。而對於通俗文學自身獨特的發展線索、與新文學的關係研究，也很難說不被五四的強大氣場牽制。五四彷彿成了一種怪獸，任何試圖向它靠攏的舉動，結果不是被它吞噬，就是被消融了自身面目，而它的封閉特徵也使其變身為自大狂，藐視一切異質元素。文學史本來處理的是最該鮮活的景象，結果卻成為「鐵板一塊」（頁249），抽繹成幾根乾硬的線條。

不少研究者努力反撥這一現象：無論是大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的提出，還是海外強調近現代文學中的「百年」意識，或是提出要以「民國文學」代替「五四文學」（雖然將

辛亥革命當成了學科發展的起點仍然是一種政治性的斷代方式，但其提出理由卻是「民國文學」比「五四文學」更具包容性），都是基於對作為起點的五四的深思。研究者也在通過各種議題揭載現代性發生絕非五四的獨創發明、傳播現代文化的也並非只有新文化人，這是一個早就悄然開啟的過程，將頭緒複雜的歷史籠統概括為五四傳統，不過一種圖方便的有意偷懶。

而對於「五四」以外文學的發現，讓那些「非五四」文學重回學術論壇，思考從晚清到1930年代這一長時段歷史中不斷「迴響」的文學現象（頁174），是學者的努力動向。五四應當不再被當成橫空出勢的認知對象，對於在它之前、同時、其後發生的故事，研究者有必要進行細心的描述。長期以來，在大陸語境中被當成五四對立面、被貼上「反動逆流」標籤的種種文學現象未能完備地進入研究視野（頁42）。然而正如有學者所思考的：沒有一種文學史是可以通過全盤否定前代文學脈絡的方式來敘述的（頁17）。作出這類簡單否定的原因或許極其簡單：質疑者們沒有看過相關材料，只憑主觀想像就發表否定見解。也許，等到真的打破所謂的「正統」的那一天，憑藉的是每一個人的努力（頁95）。

二、可複製與不可複製的學術人生

受訪者們的璀璨成績，使其成爲一個令人欽佩的群體，他們的故事既概括出學科發展歷程的一種縮影，啟人思索眼前的困境與機遇，又令我們想探尋其一路走來的詳細歷程，產生與之對話的衝動。

但這番與學界群像晤談的「對照記」，並非總是給人帶來收穫的驚喜，或許更多的是失落。他們的群體故事，彷彿只是爲了再次印證傳奇不奇的平凡人生。令人豔羨的種種精彩與揮灑，只不過來自時間的適時贈予，他們並未得過特別眷顧。當我們看到一位長者已在自己的園地裡耕種了五十年，便會明白那些稀有材料的發現，乃是緣於

長期浸潤其間訓練出來的敏銳嗅覺。而當他們輕輕道出要以生命來等待史料出現的淡定（頁447-448），則使我們追問以須臾人生泛舟於無涯學海之際，如何才能使前者獲得片刻永恆。他們的答案是極其簡約的：生命本身便是與時間對抗的薛西弗斯式的困境，著作是將名字寫在水面的唯一工具。因此，由書裡人生來環顧己身，把百年人生投注於一段並不漫長的歷史，雙重短暫性在導致焦慮感的同時，更要求我們要具備恆心與耐力，將學業真正變成志業，成為與時間賽跑的人。

書中的大陸學者在見證歷史風雲的同時完成了代表作，他們的人生模式對於當代青年學人來說其實是不可複製的。他們的世代決定了當其開展研究之初，有可能通過與研究對象本身打交道而接觸歷史，文章因此而印有一層鮮活的色彩；而當我們踏上征途時，歷史已經定格成為資料室裡的泛黃舊刊，只能依靠想像來拼接往昔的碎片。

更重要的是，不少人在一種今天無法想像的艱苦條件下拿出了代表作的雛形，或開啟了一生思考的起點，現在學術研究講求的諸要素：時間、資料、資訊等對當年的他們來說都是奢談。但他們卻擁有一樣東西是今人缺少的：純粹為了探究真理的強烈願望，以及被剝奪和壓抑後復原自我的反彈爆發力。凝視他們的人生，雖然會覺得可惜可嘆，年屆半百才開始安心作學問的現象並非僅見，但接下來卻不免引向對自身的省思。時代在賦予他們磨難的同時，也補償了他們思想者的氣質。書中主人公也在集體尋喚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大陸青年學人：如何建立屬於這一代的人文自覺，讓著述真正擺脫稻粱謀的浮面？實際上，當代人最缺少的便是探知真理的需求，愈益精密的專業化分工使得皓首窮經成了相當正面化的表述，學術與技術日趨混同，人文研究中最精髓的反省與懷疑能力卻在減退。而當學科格局本身便容易走向逼仄的時候，過度埋頭於自身的專題研究有可能最終喪失俯視歷史的角度。

反思和關懷，從小處看會帶來選題眼光的提升，如他們反覆提醒的：思想穿透力有時能使歷史細節變得充滿意蘊，使人對文學史脈絡

具有全域把握能力、從而描摹出清晰的歷史畫面。但更重要的是，對真理的追求會使研究者擁有對個體與歷史命運的整體判斷，而這樣的理性直覺會使研究者的視野不再囿於一城一池，而是站到了制高點，掌控了直覺歷史大勢的能力。

對於海外學者來說，同樣也是如此。他們的學術面貌個性十足，自身經歷也充滿差異。但從地域背景來看，卻很明顯地具有一種多元與開放色彩：出生國與工作國相同的只是受訪者的一部分，戰爭或遷徙使他們的人生地圖不斷延展著。所有人都曾過著「候鳥飛行般的學者生活」（頁209），不少人是頻繁造訪世界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活躍分子」，文化與地域的交融使他們的研究充滿活力，融進生命體驗的文化碰撞，在他們的著述中留下痕跡，熔鑄出獨特的學術面目。有學者將「跨文化」作為自己的中心概念，以城市的邊緣性來確證知識分子的邊緣位置（頁263、273），有學者更明白強調「地理空間的位移」對學術養成的重要性（頁37）。然而這種空間位移，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並非完全由個人意志所決定。今天大陸青年學人所面對的現實境遇是資源相對集中，更多人很難得到採擷他山之石的機會，要實現更多的跨文化學術之旅，實有賴學術平臺的合理搭建、訊息資源的共用。

人生雖然是不可複製的，但學術道路卻存在著複製與借鑑的可能。在攬鏡自照的心態下閱讀受訪者的學術心旅，會發現他們往往毫無保留地為後學指點了自己一路走來不斷採用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正是使學術真正薪火相傳的工具。

剛開始學術訓練時，一切從史料出發會被特別強調，但資深學者們卻在此基礎上開始強調史識的重要，認為以問題為出發點，提出、論證並解決一個問題的能力應該得到更多訓練，「能不能對歷史建立一個論點更重要」（頁88）。這實際上就是歐洲漢學中的詮釋學：在各類材料的迷障中，用詮釋學的方法去整理並理解材料，這對於踏上學術征途之初的學人來說也許更是一番考驗。在追求歷史「真實」的

強烈願望下，我們往往對史料抱有一種尊重又無奈的複雜態度，這樣的方向點撥，對於不知該如何走出沼澤的青年學人來說或許正是一種太必要的引導。

但如此一來的困惑在於：該如何處理史料沒能覆蓋的空白點？對此，不只一位書中主人公強調了與審問明辨同等重要的想像力的地位，嚴謹的學術與浪漫的想像其實結有意想不到的緣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絕大多數情況都如同一位不見面、只依靠鴻雁傳書的筆友，怎樣才能通過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的方式保持心有靈犀，其秘訣便在於藉助想像來鉤劃作家的心路歷程、「心中要有一個完整的圖像」（頁113），即便只有一個遙遙的背影也要有憑姿態補描五官的本領。這樣一來會使歷史對象在長眠中轉側，也使得研究做到千人千面，而在史料基礎上設身處地地去感受、去同情對象，通過自我營造一種似曾相識的氛圍，讓自身進入研究對眾的時空，是完成這番無障礙溝通的有效途徑。

具體情形當然更要複雜得多。史料與史識的關係，或許注定是一場追逐不休的拉鋸戰。很多人了然對材料竭澤而漁的必要，但這一完美主義常常帶來的不是更充沛的自信，反倒是一次又一次因無法窮盡材料而擱淺既定設計的苦惱。在史料掌握的「精」與「博」問題上，他們的習慣做法是：無論閱讀量多大，先要通讀自己領域的基本文獻、並且要反覆精讀；接著要能從不完全的材料中看出關鍵問題來，並根據問題的要求展開二次尋覓，而非上窮碧落下黃泉式地漫無邊際。此類點撥不乏一語驚醒夢中人的效果。在海外學者眼中，大陸學者以「對材料之掌握」見長，而他們認為要達到「理想的狀況」則須在「在掌握材料與思考議題這兩者間取得平衡」（頁33）。「一個好的學者最重要的不是看過多少東西，而是會不會思考問題、把看到的東西整理出來，不只要有條理而且要有新意」（頁33）。或許歷史真相就是在一次次注定無法抵達的跋涉中被層層揭開，或許一聲棒喝之後，我們仍然可能為了一點點的不甘心而一頭紮進史海中掙扎……但

正如資深學者自己宣稱的：學術訓練是一種終身過程。「不斷要受訓練」或許正是研究者的宿命（頁92）。

聆聽前輩談心的另一大收穫，是其思路中呈現出一些共同路徑可供揣摩，甚至他們自剖心跡、金針度人式的講述中直接蘊含著不少有價值的生長點。如他們相當重視文學史中那些仿佛白茫茫一片大地似的空白點，對好像什麼都沒發生的歷史缺口保持一探究竟的好奇。例如在小說史研究中對「無」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視；指出近代小說中尚存大量空白未能探討，提出要重視大量小說出版的1900-1910年這一時段、認為對1930年代文壇也要繼續開掘。在文學史研究中，注意被突顯的線索之外的作為潛流的文學脈絡、關心焦點文學區域以外的其它地域、注意到某個始終不被重視、但又對文學進程產生實際影響的群體、留心某位作家被討論得不怎麼充分的文體的實際價值。既重視文本，又注意矗立在文本背後的社會脈絡的具體聯結，將文本內外的世界並行考量，等等。

在多年實踐之餘，他們具有一種轉換常規視角的功力，往往能從人人眼中皆有的尋常現象中提煉出人人筆下皆無的新意來。如大量現代文學文本從藝術角度來看品質不高，與其為賦新詩強說愁、斤斤計較於一星半點的藝術火花，不如將它們視作一批「時代文件」，關注其在留存時代心理狀貌上的群體價值。又如面對近現代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報刊研究，有學者指出報刊長久以來僅被當成材料使用，而報刊本身作為一種物質性存在卻具有太多內涵值得挖掘。還有人關注到兩股看似涇渭分明的文學流派的相通之處，當某一議題在一流派那裡已被討論爛熟、而另一流派則還是白紙一張時，持續深入的視角便自然形成了。

他們又是提問題的高手，所列舉的問題具有舉一反三的示範性。如韓南提出：十九世紀的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到底了解多少（頁105）？這個問題同樣可以拿來詢問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作家。如果將相隔一個世紀的兩批中國作家面向西方文學的胸襟與視野放到一起比

較，則以往探討起來稍顯拘謹的五四初期新文學譯介外國文學的議題便會顯出新的活力。甚至，這種問題還能開啟另一番思索：是否只有站到歷史舞臺中央的主角——新文學作家全面擁抱了西方文學？被他們批評的作家、隱沒在黑暗隅角裡的那些身影，他們又對異邦新聲抱有怎樣的心態？在此類元問題的照射下，原本看似動力不足的舊題目有可能會遇到新契機。至於這種提問能力的養成，有學者則坦言源自對自身所處教育體制的反思，認為應試教育中往往只重視如何答題，對沒有解答的問題便視而不見，有感於此才開始了自我摸索的歷程（頁214）。

閱讀的收穫還包括解決最開始的疑惑：資深學者們那種「四通八達的學術景觀」（頁115）是如何漸次形成的？尤其是當青年學人對比眼下往往只在關注某一具體話題的境況，是否相形之下愈發顯得格局狹小？讀完本書後謎團則迎刃而解：原來他們是如此重視個案研究、對其價值大力表彰，認為「小發現」正是大問題的「突破口」（頁224），只有落實好一個個小問題，才可能推進整體認知，一切全域觀照均由個案挖掘上升得來，或更準確地說，整體眼光的獲取只不過來自對個案結論的適度發揮。

而這種「逐級攀登」（頁392）的歷程，又往往伴隨著極大的偶然性。他們宣稱永遠不能預測學術的下一站（頁109），這不單單是一種謙遜的表達，而是思路的自然伸展會引導研究者接觸此前意想不到的材料，既無法用既有模式來束縛自我，也無從預料尋寶或探險會以何種形式收尾。例如因深入接觸到一位作家的某方面話題，進而鉤連起前前後後的作家在這一點上的共通性，由此建構起作家系譜與比較研究的思路與方法（頁231）。如此一來，他們便有可能對別人無從觸碰的通史、專論發表見解，並因之前的個案積澱而有了底氣。儘管風格質樸的他們說自己「沒有計畫，一切都在平淡中自然發生」（頁113），然而其學術領域卻如同蛛網一樣由某個點擴散開來，每個點又彼此連結、相互牽動（頁304），而每一塊園地均具有風向標的啟示。

與這種不斷伸展的路徑有所不同的是，另一種思路演進呈現出「起點—轉移—回歸」的軌跡：即由某一研究對象出發，在實現了精彩轉向與位移後，又以更深入的形式回歸研究原點。但這種不斷重來的背後，既要求學者對研究對象情有獨鍾、別有興會，更要求其能夠不斷翻新、層層遞進。在作家研究中，由對具體人物某一議題的探討，到對與之相聯的關係人物的研究，再到勾勒出一群交遊密切的人物構建的社會關係網（頁376），看似是膠著於具體人物，實際卻呈現出根基穩健、漸次開闊的局面。在對新文學史的探討中，由新文學作家入手，進而將新文學放到中外文學的比較視野、同時又納入通俗文學的發展線索，之後再回到新文學探討時，必將獲得更寬闊的視闊。正是在不斷跳脫與回歸中，研究者們以治史的眼光，與研究對象之間保持著沉浸其中又超脫物外的理性距離。

這番不斷受啟發的理性過程，其實又潛藏在閱讀時持續衝破固有想像力的感性之旅中。本書的副標題為「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實際上表明它是一冊該領域的學案匯編，其方法論意味相當明顯。通過放眼寰宇、展示一批活躍在學術前沿的著名學者的個性面貌，於回顧學科發展之際對青年學人產生特別啟迪。足夠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看出他們在治學思路、問題空間等方面往往傾囊相授，讀後會為重新意識到學科自身蘊含的豐富潛能而頗受鼓舞。而他們在面對後學時最令人動容的姿態是，不僅講述如何將生命體驗融入學術思考的過程，更不憚於回顧那個曾經青澀的自己。不止一位已取得卓異成績的前輩敘述了自己最初因某本工具書走入一個選題，那種簡樸親切的感覺，彷彿讓每個人都看見了昔日自我的身影。

「他們」的故事對「我們」的意義，或許可以用那個古代火把競走比喻來概括：所有人的技巧與努力，都在於如何將光明的火炬交到後來者的手中。火光照亮了周圍的黑暗，儘管只是一瞬間，但充當光明使者卻是個體對於宇宙的使命。